



钢铁长城 摄影/黄选平

##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 杨晓霁 胡大浚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卉异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也基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既是中华民族历经两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功,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边塞诗是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的艺术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即使许多诗人未曾亲涉边地,但只要他心系边塞,吟咏塞上风物人事,总要以特定边塞区域为立足点。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大约有2000首,而其中与大西北有关者达1500首之多。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陇右山川。


唐分全国为十道。西北为陇右道,辖地极广。唐史所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指的大抵都是陇右道之地;然其军政重心则在今甘肃省区域内。《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中除北庭、安西二都护府在今新疆东境,陇右节度驻地的鄯州位今甘肃毗邻的乐都外,余下的著名州郡都分布在今甘肃境内。今人因此多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省。这里,地域上与京都所在的关中接壤,唇齿相依,实为辅卫首都的肘腋。陈寅恪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陇右实为唐王朝维护版图统一、稳定政局的要害之地。陇右的安危,对唐王朝的盛衰兴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代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关注陇右。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486900人,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14.8万人,军马3万匹,均约占全国总数的1/3;若加上北庭、安西两镇,则为数尤多。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出陇右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唐王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陇右,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机会,也使更多的人文心驰神往于这方热土而竞相咏歌。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亲涉陇右有诗传世的知名者即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等均在其中;不知名者,仅从诗人赠答送别之作考察,更难以数计。大批文士远赴陇右,不但使描写西北边塞的诗歌数量大增,而且诗人们亲临其境的创作,较之仅凭热情和想象,借边塞题材寄寓某种理想、心态的“泛咏”之作(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作绝大多数如此),尤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是依靠“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的”!这更应是唐代边塞诗之所以能一举跃上边塞文学艺术之巅的“秘密”所在。比如骆宾王,那“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报国壮歌,固然激动人心,而更加摄人心魄的还是他沿陇右、河西行军远赴西域的一系列纪实之作:“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汉月明关陇,胡云




**杨晓霁**  
YANG XIAOAI

1962年7月生,甘肃泰安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乐府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对外汉语系主任,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音乐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瀚海驼铃——丝绸之路之上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宋代诗声研究》等。




Cultural Gansu  
甘肃



**胡大浚**  
HU DAJUN

1937年生,广东潮州人,又名达俊。195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籍整理等的研究及教学,主要著作有《先秦寓言选》《王符〈潜夫论〉译注》,主编《唐代边塞诗选注》等。



Cultural Gansu  
甘肃

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温。成古秋空合,沙塞宿雾繁……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早秋出塞寄东台许正学士》)将报国思乡之情融进西塞疆场写生式的图画里,读来更觉深挚真切,成为开盛唐边塞诗风之先的作品。又如王维,以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不仅在诸多乐府诗里歌唱过“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侠少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弃置”老将;抒发自己“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的壮志;歌颂唐军威镇西塞无可比拟的声势:“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而一旦踏上陇右边塞,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直寻”之作创造了诗歌艺术的辉煌。其他如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军行》七首其五)等等传诵千古的名篇,也都产生于西塞生活真实体验的基础上。正因如此,有较长西北军幕生活经历的岑参、高适,其作品达到边塞诗歌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将唐代边塞诗作总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陇右边塞的局势,大抵规定着“四唐”边塞诗的主旋律。初盛唐西北国土的开拓与边战的胜利,使边塞诗高扬着理想的光芒;安史之乱后,陇右失陷,使志士扼腕,万姓怨愤,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也当然成了中唐边塞诗的第一主题。不仅陇籍诗人魂牵梦绕,“只将诗思入凉州”,众多从未亲临西塞者,也莫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片神圣的国土:或神往于“人烟扑地桑柘稠”(元稹《西凉伎》)、“无数铃声遥过碛”(张籍《凉州词》)的昔日繁荣,或感伤于“河陇侵将七千里”(白居易《西凉伎》)、“万里人家皆已没”(王建《凉州词》)的惨痛现实;或怒斥“连城将但高会,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的颓靡世风,使边塞诗的题材进一步开拓,思想内容也得以深化。大中时,河湟收复,河西归唐,举国欢腾,诗人们激情洋溢的颂歌在晚唐衰微的诗风中不啻为鼓舞人心的强音。这些又清楚地显示了陇右地区及其文化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陇右地域辽阔,但大部分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沼泽冰川,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干旱严寒,气候恶劣。关内人士初涉陇右,首先面对的是“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蹇梯”(许棠《过分水岭》)的千岭万壑;进入河西,历经的更是“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无边瀚海,几乎无一不经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巨大震撼。惯惯江南秀色的岑参为之情绪亢奋,诗作生面顿开;陶醉于旖旎山水的王维,为之诗情激荡,绘出雄浑壮景;一心追逐功名的高适,为其感发,往往“登陟以寄傲”(《陪侍御宴灵云亭宴诗》序);就连那“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踏上陇土,西塞山川胜迹即成为他歌咏的主要题材。面对使侏儒也能变成巨人的“这样的天地”,诗人们放情高歌,骋足风流,从“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杜甫《秦州杂诗》四)的秦州,至“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的走廊西端,举凡丝绸之路今日甘肃境内这黄金路段的主要城镇军戎和通道,高山大河,茫茫戈壁,苍凉的古战场,以至镌刻着数千年中华古史的众多文化胜迹,都无一例外地融入边塞诗的画廊。仅以岑参而言,他从“平明发咸阳”而“暮到陇山头”,“经陇头分水”而“西过渭州见渭水”;宿临洮,达金城,至凉州;“过燕支山”、祁连城,“夜宿祁连城”“朝过酒泉郡”;经瓜州晋昌郡而达西塞门户敦煌城;不但西出阳关到达安西都护府,又曾出入玉门关,往返奔走于丝路北道至北庭都护之地,所历所感,均一一记在诗中。呜咽的陇头水,引发的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壮志;大漠风沙,激起的是“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深情;边城军幕的壮景,更酿出“一生大笑能几回”“醉争酒盏相喧哗”(《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玉门关盖将军歌》)的豪气!在西塞严峻的地理气候背景下,众多诗人敏锐地发掘着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蕴,形之歌咏,便在苍凉的底色中透出瑰奇的光彩与跃动的生命力。从“悬崖置屋宇”(杜甫《山寺》)的麦积山石窟,到“重开千佛刹,旁出四

官”(佚名《莫高窟咏》)的敦煌千佛洞;由“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鸣”(佚名《白龙堆咏》)的鸣沙月泉奇景,到“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沙依旧种桑麻”(佚名《敦煌》)的绿洲形胜,以至传说神异的鸟鼠山、崆峒山、回中、禹穴(今炳灵寺)、积石、三危、渥洼天马……这许许多多第一次出现在古典诗歌中的“陌生”画面揭开了古代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些诗与岑参等描写“西域”的诗作一道,成为唐代边塞诗以至唐诗中最富奇情异彩的一部分,在“胡风”浸染的唐代社会里广受欢迎,传诵吟唱,直至后代而不衰。林庚先生以为,如果“没有生活中无往不在的朝气,所谓边塞风光也早就被那荒凉单调的风沙所淹没”(《唐诗综论》);反过来说,没有浩瀚大漠的感发、雄奇艰险山川的砥砺及时代所赋予的蓬勃朝气,同样不会表现得那样令人振奋。“边塞粗犷豪放的生活情调、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更适宜于诗人的想象,并常常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超越现实痛苦的纷纭扰攘之上”(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无疑得力于陇右“江山之助”。而其助力尤深者,还在于陇右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人文精神。

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更成了华夏文明与西域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西方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古代中原人士则把越陇坂至陇右看作离乡去国步入边塞的开始,一旦出了玉门关便完全置身“异域”了。这完全不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却恰恰可以窥见这个地区在文化地理上作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文化过渡地带的鲜明特色。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陇右“首府”凉州作过这样的描绘:“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事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悉的中原风格。”(《唐代的外来文明》)作为一个“典型”,我们正好借用它来概括说明多民族混融的陇右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质。而这些,又正好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陇山东麓的泾、原诸州(今甘肃泾川、平凉一带)为关中通河陇的交通要道,王昌龄等至此,所见“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王昌龄《山行入泾州》)、“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便感慨于“居人只尚武”(喻龟《晚次临泾》)、“所嗟异风俗”(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杜甫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目睹“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马骄朱汗落,胡舞白翎斜”(杜甫《秦州杂诗》)的民风民情,不禁为西塞的安危而深忧。秦、原以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也发生着从农耕为主向农牧兼重的过渡,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比重愈大,“胡风”“胡俗”亦越见浓郁。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观凉州赛神》,对“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和“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热烈场面的描摹,让我们对此地农牧骑射民情有更直观的了解。元稹《西凉伎》里那“葡萄酒熟热饮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整,胡姬舞醉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画面,尤能传达出胡汉文化融汇的斑斓氛围。“胡腾本是凉州儿”,西域乐舞的扎根凉州并进而风靡天下,与陇右边塞诗歌的成就、影响,恰恰是同一文化底蕴的产物。生性好奇的岑参,对此最敏于感受,作了最生动、多侧面的记述:

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泥金盏盘,娇歌艳新妆。

(《武威送刘判官》)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

(《玉门关盖将军歌》)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

(《敦煌太守后庭歌》)

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依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多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奇异的器皿、中原少见的种种美味山珍——交河的葡萄酒佳酿未饮已醉人,西北高原的牦牛整个儿烤得香喷喷,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别具风味的驼蹄酥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陇右西域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陇右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三辑)



分水岭是甘肃省境内甘川公路上一道独具风格的景点,海拔2980米,俏生生地矗立在渭源和漳县之间。它是黄河两大支流洮河、渭河的分水岭。摄影/黄选平